

「蔣夫人宋美齡 女士行誼口述 訪談」訓練 座談紀實

主辦單位：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時 間：民國 102 年 3 月 4 日、11 日

地 點：國史館 4F 大禮堂

紀錄整理：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許秀孟

口述訪談是保存史料的一種重要方式，國史館歷年來持續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其出發點不僅是為採集史料，更積極的目的是提供研究者可資引用，具備信史功能的材料，而從中考探重要的歷史問題並獲致解答。緣此目標，國史館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的合作計畫中，為加強口述工作的理念與操作，特邀請國內深富實戰經驗，著作等身的專家學者，為本館進行兩天共九場的講談，分享口述工作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因應之道。

在九場座談中，每位講者側重點各有不同，從口述訪談的發展、核心價值、口述工作進行前後的面面觀，在本次會議中都可得到多元而豐富的經驗傳承。國史館主任秘書陳立文教授和國史館張世瑛協修，對口述工作的方法與策略，所談甚詳。陳立文提醒事前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功夫，包括掌握當事人的身分地位、學經歷與時代背景，並蒐集與當事人相關的報導、檔案資料等，以擬定最切合訪問主旨的題目。到了訪問現場，錄音、錄影與照相都是必備的工作。此外安排不同的座位有不同的問談效果，例如與受訪者面對面交談，屬質詢式；與受訪者對角坐，為談話式；與受訪者併坐，則為談心式等。而訪問進行中，也可請受訪者提供照片，幫助鮮活其記憶。但有幾點需注意的是，不要主動提起受訪者心中的創傷、怨恨的對象與隱私，但若其屬重大情節，必須由

當事人解答者，仍以循循善誘，避免強迫為原則。

張世瑛則談行誼訪談的執行策略。張指出口述歷史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個人一生經歷的訪談，一種是主題式的訪談，行誼訪談可說是主題式的口述集體訪談。其重點放在受訪者與行誼人物間的認識經過、互動關係及個人主觀看法。在擬訂受訪對象時，要採取同心圓的方式，由最內圈的伴侶、家人、親戚、姻親等；再次是同學、同鄉、同僚、師生、事業關係等；最後是部屬、隨從、非固定型的人際網絡等旁支關係。此外，基於東方文化中「為賢者諱」的觀念，行誼訪談過程中要注意受訪者的主觀價值與一面倒的正面肯定，而適時搭配開放性問題，以充實訪問的內容。

關於訪問題目的設計方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與國史館周琇環協修，分別以女性訪問特點以及宗教信仰為指標，提供參考意見。許雪姬認為女性在歷史記載中往往被忽略，口述訪談是呈現女性歷史的重要手段。女性的敘事與男性也有很大不同，女性較常談到婚姻、家庭與兒女，雖然如此，但職場上女性也常會有與男性不同的性別感受。例如對工作待遇與升遷、工作權益等的想法，都能突出女性受訪人的特性。周琇環研究宋美齡的宗教生活，認為宋美齡身前不願接受訪問，也沒有留下重要資料，而基督宗教著重在對神信仰與個人的修為，所以針對宋氏的宗教生活進行訪

談，受訪者應會樂於公開宋氏一生的見證。相關的宗教生活問題，諸如教會聚會的情形，從早期宋家的聚會，到宋美齡婚後以及政府遷臺後，經歷什麼樣的轉變；又宋美齡的靈修習慣為何，與蔣中正是否互相配合等問題，都是了解宋氏宗教生活的切入點。

對於不同訪談群體，國史館侯坤宏處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羅久蓉副研究員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林明洲組長，分別分享了對佛教人士、庶民與小人物的訪談經驗。侯坤宏由於長年研究佛教史，對佛教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有很深的理解，認為藉由口述史料，能補充許多文字史料沒有記載的歷史。而佛教人物，或是任何宗教人物的訪問，有一個特點是需要注意的。由於他們是社會分工中的「專業宗師」，他們在宗教實踐與修行上，理應超過常人之處，所以他們的經驗才如此重要。但問題在於他們的修行經驗，未必是全對，所以還是要再以經論來檢證。羅久蓉與林明洲皆談小人物的訪談意義，羅久蓉認為小人物的歷史常常被忽略，也容易淹沒在大歷史的洪流中。由於沒能留下太多文字史料，對於前人的生活細節反而一無所知，然事實上食衣住行、娛樂休閒卻是構成每人每天生活的要素。因此小人物的口述訪談是必要的，小人物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感受，就是走過時代而留下的痕跡，是芸芸眾生，你我他最平常也最不可或缺的生活經驗。林明洲以其親身尋訪地方耆老，採集快要失傳的風土民俗、

傳統技藝，指出這些史冊沒有記載，屬於口耳相傳、錘鍊技術的珍貴文化，口述歷史是最好的傳承载體。

口述訪問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紀錄稿（整稿），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陳進金副教授和名作家汪士淳對整稿工作提供實質建議與寫作策略。陳進金認為整稿最必要的就是考訂，這是考量為往後研究者留下正確的資料。考訂的內容是關於事實的部份，包括人名、地名、年代，以及專業知識的查證。若是受訪者的主觀情感與道德判斷內容，則不需要考訂。而受訪者明顯虛構、誇大的談論也要慎重的查證。例如受訪者對二二八的記憶，是親身經驗，還是透過閱讀來的，會影響其記憶的真實度，可多問受訪者當時在哪裡，做什麼事，以求得更精確的回憶。此外，地名、校名等應注意時空環境的改變，例如中央大學的前身是東南大學，從改名的時間點也有助於判斷受訪者所談的年代背景。汪士淳以記者對新聞性、話題

性議題的敏銳度，建議口述歷史可多重視章節、故事性、戲劇性的安排。對於受訪者口述的空隙，訪問者要盡量蒐集資料補上。然汪士淳也提醒口述歷史出版的目的，是考量要留千秋的史料，還是希望推廣能見度，這會決定整稿寫作的策略。

座談的最後，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教授總結口述歷史的發展、演變與檢討。呂芳上以臺灣最早進行口述工作的機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近四十年期間所進行與出版的口述歷史為指標，認為近史所口述歷史的發展深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影響，有偏重上層人物的訪談、著重生平講述而非專題式訪談、重視抄本不重視錄音帶等問題。並且臺灣目前缺乏對理論、工作手冊的研擬製訂，造成口述訪問專業程度不一、問題設計不良、訪談內容扭曲等問題的發生。因此當務之急，應盡快建立臺灣口述歷史的專業知識及工作倫理，使口述歷史能進入更深的討論層次與研究領域。